

温暖而有力的声音

周晓枫

写作三十年以来,我接受过一些采访,更喜欢笔谈。因为我表面练达,骨子里慢热,未必能在面对陌生记者时娓娓道来,仓促中容易顾此失彼,词不达意。何况总是重复性地解释自己,让我有种自厌的消沉。对于创作还能说什么呢?如果真有妙语,我早放进创作谈里了;何况我不愿意成为不会创作只会写创作谈的作家。当然,创作谈也绝非易事。创作还是有形象和修辞的依附手段,创作谈相当于提炼出来的公式——你不可能拥有很多的公式,尤其难以使其生动。看似侃侃而谈,暴露不过是乏善可陈的庸见。笔谈好得多,起码能替换几个近义词。

《文学报》的采访是个例外。记者要做专访,从业资历颇深的他坚持要现场,我不敢多做反抗。可藏拙的摆拍能给我安全感,不至失态和丢脸。我省悟,之所以说“现丑”,“现”可作“表现”来解,也可作“现场”来解。他像个纪录片导演,非要追求那种粗颗粒的真实质感,可他不知道,有多难为我这种拿不到剧本就心慌的演员。不对,他知道!他蓄意不让提前准备以去除做作,被访者由于没有时间化妆只得素颜登场。

采访在极其嘈杂的环境中进行。那是全国的年度大型书展,展厅多、面积大,场馆的举架很高,仰头极目远眺才能看清顶棚的细节。人头攒动,关键是场地不拢音,整个过程他和我就像两个耳背老者那样“啊啊啊”地追问。

这种干扰并未磨蚀我的耐心,因为他的判断基于对作品的直接阅读,及物且点穴,他的一些提问我此前从未思考。比如他不认可我几乎已被定性的“华丽文风”,像《落日故人情》《离歌》等,他认为非但不华丽,甚至可以用质朴形容;比如他提到的辩证思维、真实性和真实感的区分等等,都使我看到被忽略的盲区。这种交流弥足珍惜,让我的表达不再顺着自己旧唱片的凹槽循环下去。

后来见到这期文学报,占了整版封面的胖大婶吓我一跳——经过油画般的图像处理,我依然气壮山河。我按照记忆的惯性,以为自己体型适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这么膀大腰圆、五官混沌,慈祥得略显弱智。好像就是从那次开始,我正式认同自己跨入微胖界,并放弃几乎所有中号尺码的衣装。《文学报》让作家的形象占据头版和主页,也像一面自我认识的镜子,让映照中的写作者能有所自查和内省……就像它四十年来做的一样。

我并不了解《文学报》四十年来的发展脉络,与其说是对《文学报》的感情,不如说是对人的感情。对《文学报》的编辑,我深怀谢意。我写了多年散文,年近半百的时候尝试童话,我心怀忐忑,并没有训练多年带来的创作自信。我说过,那个感觉像是练习书法,左手写字帮不上右手的忙,右手写字帮不上左手的忙。对我来说,写童话比写散文难;写第二个童话要

比写第一个童话难;写第三个童话要比写第二个童话难……写完喜剧《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我几乎在崩溃的边缘放声大哭。而我最早得到的鼓励声中,就有《文学报》的编辑,她所给予的,不仅是批评家的专业意见,也是写作者给予同道的理解与支持。她不光对我是这样,对许多努力中的写作者,她都有及时的发现、鼎力的推荐。许多人都感念她的诚恳与善意。

写作孤独,作家有时缺少朋友——他甚至跟自己也不是朋友,时刻跟自己缠斗,才能在寸步难行中有所进展。这大概是所有写作者的日常状态,总是希望今天的自己赢过昨天的自己、输给明天的自己,所以,永远在折磨自己的自虐与自我挑战之中。每当完成作品,就像是朝着黑暗的大海抛出一个漂流瓶,他不知道它会被什么人所捡拾,也担忧它是否很快就无声沉没。《文学报》里这样的记者和编辑,他们的存在,给人以暖意和希望。

《文学报》的宗旨和意义是什么呢?四十年来从容不迫、步履不停,它就像海上的光。我因此想起美国作家安妮·拉莫特的一句话:“灯塔不会在岛上四处奔跑寻找需要解救的船只,只是站在那里发光。”但只要灯塔的光在,船只就不会驶向黑暗的洋面,黑暗中的漂流瓶就易于被捡拾和发现。《文学报》,让作家听到自己的回声和同道的呼应。

我想起那些果树,无论苹果、梨子、

桃子、李子、山楂这样的水果,还是银杏或核桃这样的坚果……一棵树常常因为它的果实而被命名。写作者亦如此,因自己的作品而产生价值,不过他不应只酿造一种果实,作家应该是自己的繁花树。有力的种子,深沃的土,加上耐心酝酿的时间,作家才能得以拥有写作的春天。我们可以说,文学是孤独的事业,也可以说它是最不孤独的事业。那些始终提供园地、光照和水源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让文学得以保持蓬勃与繁茂。

《文学报》,四十年来,一个又一个的版面,拼出自己辽阔的文学版图。是的,所有成绩,都不仅取决于最后的撞线瞬间,更取决于过程中的每一步。如果有一部作品能让你喜悦,那是平日训练的每个篇章、每个段落、每个句子、每个词语的点滴累积。如果有一份《文学报》让你信赖,那是它持续的积累,是它每一个报道的消息,是它每一篇评介的作品,是它每一个推出的新人,是它每一篇开展的批评,是因为它每一道不幼稚也不衰老的年龄,是它每一次温暖、公正而有力的发声……对文学始终深怀爱意,它才能成为今天这样的《文学报》。

人们经常在各个场合提到“初心”。“初”这个字,从衣从刀,指的是用刀裁剪衣料,是制衣的开始,故而表达初始之意。人生来赤裸,随后就要面对——“衣”所象征的,是温暖、享乐、声誉、虚荣等等;“刀”所象征的,是危险、疾病、困难、灾难等等。说来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可一颗心要从“衣”所象征的利和“刀”所象征的害之间穿越而无损,才算得上“不失初心”,谈何容易。然而,《文学报》就是这样,四十年来不失初心又志存高远地,走在自己的方向和道路上……所以,它的今天充实,它的未来明亮。

村庄里的《文学报》

周华诚

去年10月,我在新疆的一个村庄里,赫然发现几张历史久远的《文学报》,被摆放在陈列台上。三张报纸边缘有虫蛀,纸张极是平整,分别是1983年1月6日、2月3日和6月23日的报纸。这让我大感惊讶,又觉亲切,仿佛在遥远之地遇到老朋友一般。

我很是好奇,托驻村的干部去打听这几张报纸的来历。遗憾的是过了很久,依然没有回音。我是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偶然地与这个位于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巴扎结米镇的村庄相遇的。村庄的名字叫恰木古鲁克。我们在恰木古鲁克村里走着,村民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村庄。

原来,这个村庄的农民喜欢写诗。比如阿布拉虽然只是个初中生,却一直喜欢读书,平时也喜欢写点东西。村委会的宣传栏里,开设了“农民诗歌专栏”,每月一期刊出村民写的诗歌。村民的诗歌若是在宣传栏发表了,每首诗歌会颁发一百元稿费。阿布拉的诗句,朴素又淳朴,她的第一首诗也是发表在这个简朴的宣传栏里的。“刀郎河畔好地方,刀郎河水涌波涛,辛勤劳动能致富,人人有招心中笑……”

所以我想,这几张有年代感的《文学报》在这个遥远的村庄里出现,一定是有缘由的。它几乎可以被看作是点燃一颗文艺心灵的火苗呀,或者是催生一棵草冒出新芽的一缕春风。甚至,这样的几张报纸,在遥远的西部

跟我迎面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因为《文学报》创刊于1981年4月,那时候我刚两岁;这一份在改革开放后很有影响力的文学专业报纸在上海呱呱落地时,我还在浙江西部一座十分偏远的小村庄里蹒跚学步。谁知道在很多年以后,我会跟文学二字搭上边呢?或者,我会跟一份以文学的名字命名的报纸建立某种情感呢?

在十六七岁时,我考上了一座医学校,三年后在县人民医院参加了工作,穿上了白大褂为人民服务。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大学里有一个专业是培养作家的。这个从乡野之间成长起来的少年,觉得错过了许多好东西。之后的许多个夜晚,他趴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旧书桌前,读完了汉语言文学的所有课程,完成考试并拿到了这个专业的文凭——文凭上有“文学”两个字,那是他最初跟“文学”发生的关系——他纯然是凭着一腔热爱去做这件事,从未想过要依靠这张文凭,去改变一点点生活或工作的轨迹。

同样,在许多个孤独的夜晚,他还是趴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旧书桌前,写下了许多稚嫩的文字,感受到了文学创作这件事的乐趣。在小城,喜欢写作的人少之又少,能接触到相关信息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那时候,连“上网”这个名词都没有出现——他就那样闷头写着,写啊,写啊,一

次又一次,他把废纸篓装满,仿佛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样。

但有些事情,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因为喜欢写作,我从医院去了机关工作;因为考出过汉语言文学的文凭,在媒体要招聘记者的时候我就去了新闻单位,从此成了一名记者。兜兜转转之间,我要许多年后,才会与这张名叫《文学报》的报纸发生关系。但我已经知道,一个人,如果能全心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那是一种幸福。文学,就是我所喜欢的事情。我愿意用文学这种方式,去跟我所经历着的世界进行交流,呼吸吐纳;用文学这种方式,去呈现我的想法,表达我的意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2014年,我回到浙西那个小村庄,开展了一项名为“父亲的水稻田”的乡村实验项目,带领许多城市人回到土地,跟我父亲一起种田。我用笔和相机,记录了这一整年的劳动经历。春耕,播种,插秧,除草,除虫,灌水。稻禾从发棵而扬花,由灌浆至成熟。青蛙在黑夜中鸣叫,蜻蜓在黄昏里盘旋。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2015年,我的非虚构作品《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许多媒体给予报道。2015年12月31日,有朋友告诉我,《文学报》用大篇幅转载了我《下田》这本书里的内容。

那可能是我的文字第一次登上《文学报》。是的,这已经是很晚的事情

了。我在媒体工作很多年,写消息、报道之类的东西很多年,后来也写文化稿和特写稿,但是很少在专业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回到乡下种田之后,我的生活迎来了重要变化,我辞职了。与此相应的,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也走得更加坚定一些,事实上,对文学的态度,也更加虔诚和庄重了。我把许多重要的稿子投给了《文学报》,有幸的是,《文学报》也慷慨接受并刊发出来。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正是如此,《文学报》成为引领我进入文学这片土地的路牌,它让我看见一大片辽阔的风景。

每年我都订阅《文学报》,有的年份里,还订了两份——通常是先订了一份,后来因为不记得有没有订过,就又订了一份。这种事情连邮递员也感到奇怪,他问我为什么同样的报纸要订两份。我想了想,非常认真地回答他:一份先读,另一份可以重读一次。

这年代还在订阅的报纸不多了,很多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纸,其功能几乎可以被手机电脑取代,但《文学报》这样的报纸不可代替。我有时候想,要是我早一点遇到《文学报》就好了——如果在我童年时候的村庄——譬如说1983年,浙江西部的常山县钳口乡五联村能像新疆的麦盖提县巴扎结米镇恰木古鲁克村一样,有几张铅印的《文学报》飘飘洒洒地出现在村庄上空,我们的日子,大概也从此会变得不一样吧?